

### 悠悠往事

近日，在芝罘区华茂小区某居民楼内，年过九旬的赵信祯老先生向记者谈起自己曾参与第一代导弹工程研制的峥嵘岁月。为何他将这段经历深埋心底大半生，如今又忽然敞开心扉？是什么叩开了这段尘封的记忆？

### 动手能力强 受物理学家青睐

赵信祯生于1933年，是青岛即墨人。解放前，他亲历了青岛半殖民地时期的苦难岁月；祖父靠在青岛码头为德国舰船运送蔬菜等生活物资来维持一家的生计；父亲14岁左右就被送到停泊在码头的英国舰船上做小工，直到青岛解放，一家人才彻底摆脱“被殖民”的命运。正是这样的家庭背景，让赵信祯从小就深刻体会到：只有国家强大，人民才不会受奴役；只有翻身做主人，才能拥有真正的自豪与尊严。

高中时期，受家世影响，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赵信祯，对舰船、机械和无线电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常在学校协助老师修理广播、铺设线路，做些“技术活儿”。1955年，22岁的赵信祯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航空学院（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设备专业。大学期间，赵信祯在机电方面的动手能力得到了充分施展。1959年，为向国庆献礼，他手工制作的一台变压器因小巧精致、工艺精湛，被学校高度赞扬，称其“钳工技术无人能及”。

这次展示，引起了来做报告的物理学家钱伟长的注意。当时，钱伟长正负责某大型水利工程项目，需要制作100:1的舰船模型，并自主设计舰船的遥控装置。赵信祯凭借出色的机电钳工技能和对无线电的悟性，被抽调到项目组，参与舰船无线电遥控设备的设计与制作。

### 从零起步 攻坚无线电遥感遥控

赵信祯回忆说，当时他还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临时被抽调进了这个科研项目组，任务是攻坚无线电遥感遥控。在那个年代，这无疑是“开天辟地”般的难题。

舰船在水中的前进、后退、左转、右转等，通常由舵手在驾驶室进行操作。但作为科学实验，要将舵手的机械操作转化为岸上的遥控器信号，难度极大。当时，全世界仅有苏联和美国掌握相关技术。

赵信祯解释说，要实现遥控，需要将机械信号转化为电信号，再将电信号转化为无线电信号，过程十分复杂。其中最难的环节，便是将电信号转化为无线电信号以实现远程控制。“我们从最基础的物理理论入手，从电磁场的强弱变化开始，模拟电机因磁场变化所产生的不同频率，逐步推导出‘频分格’‘时分格’等方法，最终完成从音频试验到无线电遥控设备的跨越。”简言之，就是通过电磁变化引起频率升降、强弱变化，使发射端与远端船模设备产生“同频共振”，从而实现水中模型的加速、后退、转向等控制。现在听起来很简单，但对当时的赵信祯来说，这并非易事。他白天要完成学业课程，只能夜间在实验室进行试验。

在缠绕电磁线圈时，由于从某境外渠道进口的特制铜芯线比头发丝还细，缠绕时力度稍大就会把线圈拉断，过松又影响实验效果。学校曾安排两位“心细如发”的女教师协助赵信祯，但她俩后来都被难哭了。最终，赵信祯灵机一动，设计了一台微型电动机辅助人工缠绕——电机匀速转动，完美解决了力道与松紧的难题。他负责的船模遥控设备顺利通过验收，并成功应用于后续实验。



### 撤离发射架 最后一个撤离的工程师

任务圆满完成，赵信祯也顺利毕业，并因在无线电方面的专长被留校任教。得益于赵信祯主导设计的“无线电遥感”设备，南京航空学院在原有无线电系的基础上，增设了“遥感遥测”新专业。

船模遥控技术成功后，赵信祯在业内已小有名气。随后，他又被抽调参与某遥控飞机的“太空任务”，仍负责“遥感遥感”设备的研制。飞机与舰船虽同属于流体力学范畴，但空中环境与水环境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为此，学校派出由8名教师组成的科研团队，奔赴某科研基地，与国内顶尖专家会合，分组展开研发。

为厘清技术原理，赵信祯从苏联专家那里获得了一本俄文版《振荡器》教材，其中有最新理论与实践经验。凭借俄语和英语优势，他将教材翻译成中文，使研制工作事半功倍。

遥控飞机上的加速度传感器体积小、精度高，加上飞机本身尺寸有限，将零部件装入并实现遥控，难度极大。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团队最终攻克了方向、速度、传感压力等核心技术，成功研制出某型号的对敌作战遥控飞机。随后，研制工作进入下一阶段。“没错，就是对敌作战的火箭弹研制任务。”赵信祯回忆说，那时国家百废待兴，国际环境复杂，国防科技实力亟待提升。不久后，原子弹、氢弹、“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相继研制成功、发射升空，我国的国际地位显著增强。“这些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这些国防利器是为和平而生。”

此后，赵信祯一边在校教学，一边随时接受借调参与各项任务。在那段岁月里，他时而奔赴西南某省，时而转战大西北，足迹遍布沿海地区与戈壁，踏遍祖国国防科研的广袤大地。

在国内某实验基地，赵信祯参与了第一代某型号导弹遥感遥控器的设计项目。导弹制作完成后需进行性能测试。在发射现场，导弹安装就位后，现场仅留下作为遥感工程师的赵信祯、一名纪录片摄影师和一名技术工程师。为获取准确的实验数据，他们在发射架50米外挖掘了3个体积为1立方米的掩体，上方覆盖石板。准备就绪后，摄影师和技术工程师先行撤离至掩体，赵信祯最后才离开发射架，迅速进入掩体。

此次实验取得圆满成功，为该型号火箭导弹的系列化工程奠定了基础。

1976年，因需回烟台照料年迈的父亲，赵信祯主动申请离开南京航空学院，回到家乡参与地方建设。在南京火车站，学院领导紧握赵信祯的手说：“学院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随时欢迎你回母校。”

### 阅兵式上 见到“老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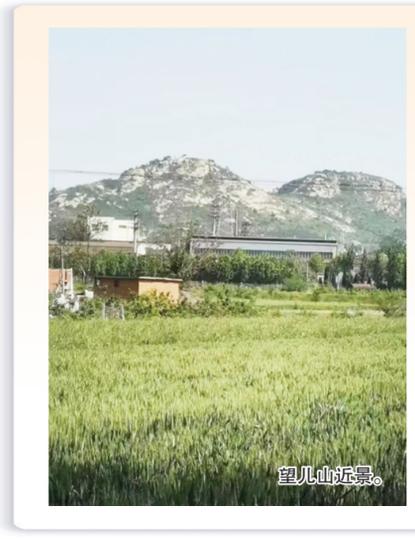
回到烟台后，赵信祯对自己参与国防科研的经历绝口不提。身边的领导与同事只知他曾是南京航空学院的教师，却不知晓他从事过其他工作。

2025年，92岁高龄、体弱多病的赵信祯躺在病床上观看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阅兵典礼直播。当一排排威武的战车驶过，车载的“东风”“红旗”“霹雳”等各型导弹缓缓进入画面时，赵信祯如见老友般倍感亲切，尘封的记忆也随之开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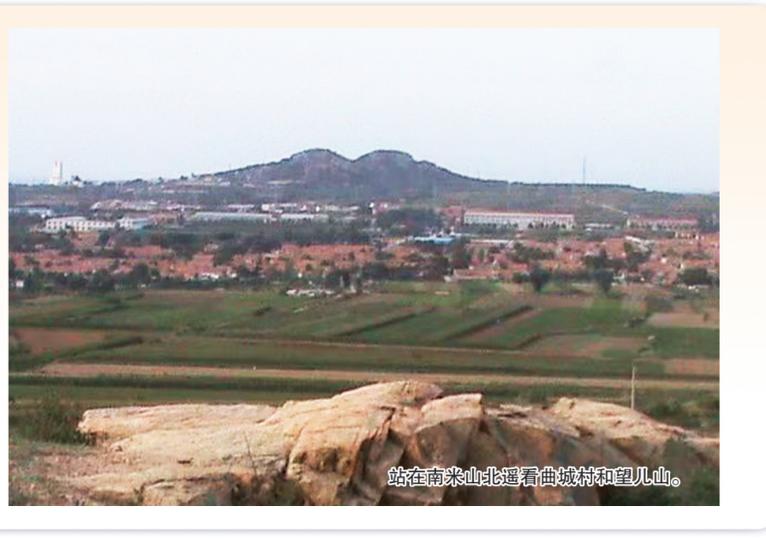
提及往事，赵信祯神采奕奕。他谦逊地表示，自己只是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攻克了一个小难题，在国防尖端项目中顶多算是个“打杂的，不值一提”。如今，国防科技实力早已今非昔比，技术水平领先世界。作为最早参与并见证航空航天国防科技发展的老一辈工程师，赵信祯壮心未已，在一帧帧胶片般的回忆中，再次沉浸于往昔刻苦攻关的峥嵘岁月……

# 望儿山坡升起的抗日旗帜

曹景广



望儿山远景。



站在南米山北遥看曲城村和望儿山。

招远西陲矗立着的“望儿山”山峰，虽不算巍峨高耸，名声却很响亮，承载了诸多民间传说。望儿山原本全域隶属于招远，1941年，政府将望儿山以西的村庄从招远划出，划归掖县管辖，自此望儿山西坡的南北沿线，成为招远、掖县两县的自然分界线。本文提及的焦家村、城子村，在当时均隶属于招远县范畴。

望儿山西坡，是一片南北走向的梯田。因地势高耸，面朝渤海，民间称其为“望海楼”。此处属山地地貌，每块田地的地堰及两端沟壑中，都长满了山松。从山下远眺，整座山坡被松涛覆盖，隐蔽性极佳。望海楼的梯田归山南的西曲城村所有，再往西，往下延伸，则是一片宽阔平坦的土地，分属于城子村与焦家村。

民国时期，焦家村有一户势力显赫的大户人家，当家主人名为焦瑞云，字慎卿。焦家的发家始于清末民初，其祖父焦文宣、焦文广兄弟二人“闯关东”经商获利颇丰，此后家境日渐殷实，势力不断壮大。起初，焦慎卿仅雇佣数名壮丁看家护院。到1935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时任山东督军兼省长的韩复榘下令，要求山东各地的农村大户组建乡团武装，同时创办乡农学校，训练培养乡丁，以此扩充国军军事力量。据传，当时胶东地区共组建了24个大型乡团武装组织，负责人被称为“司令”，焦慎卿便是这24位司令之一。任职期间，焦慎卿四处招募青壮年，扩充自家武装，同时在相距一里地的城子村，开办了第七区“乡农学校”，学员从各村农户中抽调——按照当时国民党的政策，家中拥有30亩以上土地的农户，必须派遣一名年轻男子参与乡农学校训练。部分富户亲自送自家儿孙参训，也有贪生怕死的富户，出钱雇佣贫苦农户子弟顶替参训。

1937年7月7日，日军蓄意制造卢沟桥事变，随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陷入危亡之际，招远县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一批招远热血儿女率先挺身而出，高举抗日大旗，组建起

一支地方抗日武装——望儿山坡救国团。1991年版《招远县志》第二十二编《军事》第二章《地方武装》的第四节“望儿山坡救国团”明确记载：1938年1月，刘伯音、赵金鼎联合一区乡校校长、七区乡校教导主任，组建了一支70余人的抗日武装。队伍集结至七区城子村（今属掖县）附近的望儿山时，遭到国民党游击队焦慎卿部的袭击。此后，刘伯音、赵金鼎等人以“望儿山坡救国团”的名义，继续开展武装抗日斗争。4月，“望儿山坡救国团”与“青年抗日救国会”合并，改编为“招远县抗日游击队第三十二大队”。

“望儿山坡救国团”，是招远的一批热血抗日青年，在招远“民先”组织抗日宣传的影响下，在刘儒英的直接领导下，主动发起组建的。核心组织者包括刘伯音（今辛庄朱宋村人）、赵金鼎（今蚕庄村或张华村人）、冯占堂与冯建民（今望儿山冯家村人）、刘儒英（今阜山牟崖村人，一区乡校校长）、冯某（今莱州城子村人，七区乡校教导主任）等。救国团成员均为招远县农民，其中一部分是一区、七区乡农学校的学员，其余则是由组织者带动的周边农户子弟。

1938年1月24日（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正值寒冬时节，此前秘密联络好的救国团成员，于清晨陆续赶往望儿山西坡望海楼地边的山松林间。此时，庄稼已收割完毕，农田空旷，组织者与成员只能潜伏在松林深处及沟壑之中。几位武装组织领导人汇合后，先统计人员到达情况，随后展开事先制作好的红旗，共同谋划部署武装行动的具体流程。

笔者查阅了相关史料，尚未找到关于此次行动具体目的的确切记载。不过，当时焦家村的焦慎卿身为国民党胶东地区的24名司令之一，结合民间传说可推断，此次武装起义的首要目标，便是针对焦慎卿的乡团武装——打击乡团势力，夺取其全部武器装备，正式组建一支真正属于招远县的抗日武装队伍。

万事开头难，武装起义更是如此。民间自发组织的武装力量，筹备工作难以做到尽善尽美，成员思想未实现高度统一，组织纪律也不够严明，行动过程中难免出现疏漏。据民间传说，当日上午巳时，救国团即将正式启动武装行动时，突然一声枪响，焦慎卿部的士兵已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向望海楼发起包围清剿。起义队伍立即分头迎敌，枪声此起彼伏，战斗迅速打响。70余名起义战士中，多数人未接受过专业军事训练，武器装备也十分匮乏，但占据居高临下的地形优势；焦部士兵近200人，装备精良、人手一枪，却受自下而上进攻的地形限制。双方对峙至午后，焦部突然发起强势猛攻。起义领导人见形势危急，当即下令向后望儿山方向撤退。因缺乏战斗经验，部分行动迟缓的战士不幸被俘。

事后，救国团领导人多方打探得知，此次行动之所以暴露并最终失败，是因为附近一名前往集合点的成员，途中被焦慎卿部抓获，被迫泄露了行动秘密。被俘的起义成员中，经众人多方营救，部分人成功脱险，其余被俘人员被焦慎卿部强制改造，编入其乡团武装。

望儿山坡救国团的此次武装起义，虽中途受挫，未能达成既定目标，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彰显了招远人民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以高举抗日红旗、发起武装行动的实际举措，打响了招远县抗日斗争的第一枪。此后，刘伯音、赵金鼎、冯建民等人先后加入“民先”组织，持续壮大这支抗日武装的力量。1938年4月，经“民先”招远县队部协调，招远望儿山坡救国团（成员多为贫苦农民）与招远青年学生抗日救国会（成员多为青年学生）正式合并，在招远西北部的辛庄村组建起一支新的抗日武装队伍，共约20人。“民先”县队部经研究决定，将这支新队伍正式命名为“招远县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十二大队”。

# 清初《蓬莱十景》组诗作者徐人凤小考

殷成明

《蓬莱十景》组诗是胶东古时州县名胜组诗的代表作之一，创作于清初，作者是徐人凤。

徐人凤何许人也？近年来各种报刊书籍的记载基本一致：“徐人凤，常州武进人，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进士，有才华，好游历。”烟台当地关于徐人凤的记载，基本上只有这些。

《蓬莱十景》组诗，将描写十大自然景观与记述当地历史文化融为一体，展现出深远的意境，可谓落笔精妙、入理传神。可以说，如果不是对蓬莱十大景观作过实地考察和对登州府历史文化的相当研究的人，是很难写出此组诗作的。徐人凤既不是胶东人，也没有在胶东做过官，他怎么写出了《蓬莱十景》组诗？他是什么时间到蓬莱的？他为什么要到蓬莱？长期以来，这些问题一直是未解之谜。笔者近日从明末清初江南著名别墅——常州青山庄的相关史料及其研究资料中找到了答案。

位于江苏常州城北的青山庄，建于明末，是崇祯年间宰相周延儒岳父吴襄的豪华园林别墅。从明崇祯年间到清康熙初年，青山庄先后三易其主。清初一些关于青山庄的诗文、碑铭等证实，徐可先、谢玉英夫妇是清初青山庄的主人。

康熙五十年（1711）进士、官至松江府教授的常州人蒋汾功在《青山庄记》中记载，青山庄，“国初，鬻于徐氏，传三世，渐以颓废”。意思是说，清初，青山庄卖给了徐家，之后相传三代，逐渐倒塌荒废。清初著名诗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使的莱阳人宋琬《青山庄歌为徐声服太守作》诗云：“君家别墅号青山，乃在九龙唐贡缥缈间。烟波滟滟芙蓉湖，画桥掩映菜萸湾。”由此可见，蒋汾功《青山庄记》所说的徐氏就是徐声服，徐声服就是青山庄的男主人。

徐声服是谁？康熙九年（1670）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的昆山徐乾学在《涪授中宪大夫直隶河间府知府升山东提督学政按察使司副使加七级梅溪徐府君墓志铭》中记载：“君姓徐氏，讳可先，字声服，别号梅溪，常州武进人。”又云此人乃清顺治四年（1647）进士，官至按察副使。徐乾学在此墓志铭中明确说，徐可先，字声服，号梅溪，是常州武进人。这说明，徐声服就是徐可先。顺治《登州府志》“知府”项下记载：“徐可先，武进人，进士，（顺治）十五年任。”

据清光绪《增修登州府志》的记载，徐可先至晚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底前离任。据考

登蓬莱阁可观八景：“仙阁凌空”“狮洞烟云”“渔梁歌钓”“日出扶桑”“晚潮新月”“神山现市”“万里澄波”“万斛珠玑”，另蓬莱城东15公里处有“铜井金波”“漏天滴润”两景，合称“蓬莱十景”。



（资料图）

证，莱阳人宋琬与徐可先是顺治四年（丁亥科）同科进士。他写《青山庄歌为徐声服太守作》的时候，徐可先还在登州知府任上，故称其为“太守”。

据相关史料记载，徐可先在顺治四年（1647）考中进士后，授直隶束鹿县知县，之后历任龙泉知县、庆元知县、刑部主事，顺治十五年（1658）出任登州知府。徐可先入任后，其妻子谢玉英长期居于老家常州。清代词人、乾隆年间曾在山东寿光、潍县等县任知县的嘉定人王初桐在《拾遗》中记载：“徐太守夫人谢玉英……斥其囊中数千金，买青山庄居之。”由此可见，是徐可先的妻子谢玉英斥巨资买下了青山庄别墅。

徐可先、谢玉英夫妇与徐人凤是什么关系？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文学家、大仓人陆世仪在《徐子威招同蔡仲全陈社受马升书董威正及成儿游青山庄诗》中，记述了徐子威邀请他们一群人同游青山庄的情况。他另在《毗陵八君咏》诗序中云：“乙巳，予游毗陵，相从讲论者颇多。而此八君者，实同朝夕。”此“乙巳”为康熙四年（1665）。此“八君”之中，有“徐子威人凤”，而邀请陆世仪等同人游览青山庄的“徐子威”正是

此人。也就是说，徐子威就是徐人凤，子威应是其字。据徐乾学《涪授中宪大夫直隶河间府知府升山东提督学政按察使司副使加七级梅溪徐府君墓志铭》记载，徐人凤是徐可先、谢玉英的长子，青山庄少主。康熙二十一年（1682），徐人凤考中进士。

徐可先离任登州知府后，历任刑部郎中、河间知府、提督山东通省学政按察司副使。他是在徐人凤考中进士七年后的康熙二十八年（1689）去世的，享年74岁。当时，其长子徐人凤为礼部主事，次子徐鹤为广东肇庆府通判。徐人凤的《蓬莱十景》组诗，原载于顺治十七年（1660）七月刊印的《登州府志》。该志由提督山东通省学政按察司签事施闰章主持纂修并作序，徐可先编订并作序。由此可以确定，徐人凤是在其父徐可先任登州知府期间到访蓬莱的，《蓬莱十景》组诗是他到访蓬莱期间完成的诗作。据此也可以确定，《蓬莱十景》组诗的创作时间是在顺治十五年（1658）至十七年（1660）上半年间。此时，距徐人凤考中进士还有20多年。这也说明，徐人凤创作《蓬莱十景》组诗时是很年轻的，而他考中进士时年龄已经比较大了。